

旷世名典

KUANG SHI MING DIAN



论实证精神 哲学的改造 实用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旷世名典

——推动人类文明进程的世界名著宝库

本册书目

论实证精神 (1)

哲学的改造 (105)

实用主义 (225)



论实证精神

[法] 奥古斯特·孔德 著
马 昆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目 录

| | | |
|------------------------------|-------|-------|
| 导 读 | | (5) |
| 一 | | (7) |
| 二 | | (42) |
| 三 | | (75) |
| 附 件 ^① | | (84) |
| 一 | | (84) |
| 二 秩序与进步 | | (85) |
| 三 秩序与进步 | | (87) |
| 四 细木工匠法比安·马尼安的演说词 | | (95) |
| 五 奥古斯特·孔德致克洛蒂尔德·德·沃的信函 摘要 | | (101) |

① 在原书中，附件目录与书内附件文章的标题存在不一致。——译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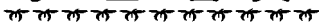
导 读

奥古斯特·孔德 (1778—1857)，法国哲学家，实证主义的创始人，他创立的实证主义是十九世纪中叶后流传很广的流派之一。孔德生于一个政治上倾向于保皇党的税务官家庭，早年在巴黎综合技术学校读书。1813年任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秘书，思想上受到过圣西门的一定影响。与圣西门分道扬镳后，他创立了实证主义，但他没有接受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而仅仅发挥了他的唯心主义。

1833年，孔德回到巴黎综合技术学校讲授数学，1848年，他发起了一个组织，名为实证哲学研究会，孔德自任导师，聚徒讲经，专门研究实证主义。作为实证主义的创始者和推动者，孔德就他的实证主义写下了大量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有：《实证哲学教程》（共六卷，1830—1842）、《实证政治体系》（共四卷，1851—1854）和《实证宗教教义问答》（1853）等。

《论实证精神》是孔德阐述其实证主义的一本重要著作。孔德认为，实证主义的“一切本质属性都概括在实证这个词中”。作为核心概念，“实证”一词具有“实在”、“有用”、“确定”、“精确”、“有机”和“相对”等含义，而所有这些都，在孔德看来，即是人类智慧的最高的属性。他的实证主义抛弃了神学、形而上学，抛弃了一切虚妄、

旷世名典



无用、不确定、不精确、绝对的东西，是人类智慧的最高体现，是最“高级”、最“科学”的哲学。

孔德认为，实证主义发现了一条伟大的根本规律，“这条规律就是：我们的每一种主要观点，每一个知识部门，都先后经过三个不同的理论阶段：神学阶段，又名虚构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又名抽象阶段；科学阶段，又名实证阶段。”实证阶段完全以“实证”的“事实”为基础，获取的是关于现象的、相对的知识，是人类知识发展的最高阶段。

孔德把他的实证主义贯穿到一切研究之中，在人类社会历史现象的研究中，他提出了一套理论，他称之为社会学，包括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两个部分。社会静力学主要论述一般的社会关系及其性质。他认为社会生活的起源是利己心（个人本能）和利他心（社会本能）的调和，家庭组织是这种调和的表现，社会则是家庭的总和。社会动力学主要论述社会的变迁及其进化。在他看来，任何社会的基础都是道德原则和思想，它们的发展决定了社会的发展。作为家庭总和的社会最根本的是合作和互爱精神，只有发挥“普遍的爱”、“普遍的同情”，才能真正解决社会的一切问题，才能有普遍的幸福的社会。孔德的理论对社会学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被公认为西方社会学的创始人。





关于真正哲学精神的性质及使命的基本见解；当前主要实证主义著作广泛传播所表现的极其重要社会意义的简要评述；实证原则在天文科学中按照其真正百科地位的特殊应用。

迄今为止，全部天文学知识一直是孤立地考察的，今后它必须成为全部哲学^①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个哲学由于近三百年所有重大科学成果的自然汇集而逐渐形成，今天终于达到了真正抽象的成熟阶段。按照这种现在仍鲜为人知的内在关联，如果这篇必不可少的序言不是主要用来界定实证哲学的真正基本精神，本著作的性质和目标就不可能得到充分的重视。归根结底，实证哲学的普及化应当成为此项教育的基本目标。由于实证哲学从历史观点或社会观点而言都主要以逻辑性和科学性的一贯优势而著称，因此，为了更好地说明其特点，我必须首先扼要重提一下在拙著《实证哲学教程》中曾明确提出的

^① “……我按照古人尤其是亚里士多德赋予此词的含义来使用‘哲学’一词，指的是人类观念的总体系”……孔德：《实证哲学教程》（1830年）第一版的作者说明。——原注

关于人类整个认识演变的重大规律。而且，我们下面的天文学研究还将经常运用这一规律。

据此基本学说，我们所有的思辨，无论是个人的或是群体的，都不可避免地先后经历三个不同的理论阶段，通常称之为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此种称谓足以表明其性质，起码对于那些了解其真正普遍意义的人来说是如此。第一阶段，虽然从各方面来看都是不可缺少的，但今后应始终将其视为纯然是临时性的和预备的阶段。第二阶段，实际上只是解体性的变化阶段，仅仅包含单纯的过渡目标，由此便逐步通向第三阶段。最后这一阶段才是唯一完全正常的阶段，人类理性的定型体制的各个方面均寓于此阶段之中。

我们的一切思辨的第一次飞跃必然是神学性的。在此阶段中，我们全部思辨都本能地对那些最不可解决的问题、对那些最无法进行任何根本性探索的问题，表现出特殊的偏爱。由于反差作用，人类智慧就在那连最简单的科学问题尚未能解决的时代，便贪婪地、近乎偏执地去探求万物的本源，探索引起其注意的各种现象产生的基本原因（始因与终因）以及这些现象产生的基本方式，一句话，就是探求绝对的知识。这种反差，今天初看起来似乎不可解释，其实是与当时我们智力的最初的真实状况完全相符的。这种原始需要，就其可能得到满足的范围内，自然得到了满足，因为我们都有此倾向：拿我们自己所制造的现象与所有任何现象相比拟，从而将人类的模式到处移置。这样一来，我们凭借着对各种现象的即时直觉，便开始以为对这些现象有了相当的认识。此种纯粹的神学精神，是这最初阶段日趋系统发展的结果。我们眼下从最先进民族中所见的是其行将结束的最后历程。为了真正了解它，就不应该局限在这一历程之内来加以考察，那远不是最富于代表性的；而必须通观其整个自然进程，以便从依次为其所特有的三个主要形式





来识别其基本特征。

最直接、最明显的形式就是拜物教本身，主要是将一种与我们基本类似的生命赋予一切外部物体，而外部物体的作用通常都较为强大，这生命也就总是具有更强的活力。早期神学阶段的最高程度以崇拜天体为特征；开始时，这个阶段与高等动物所达到的精神境界相差无几。虽然，这种神学哲学的初期形式在所有社会的智慧史中一再明显地见到，但今天只在构成人类的三大种族的少数人中才居于直接的支配地位。

第二个主要阶段是真正的多神教阶段，现代人常常将它与前一阶段混同起来。在这个阶段中，神学精神明显地代表想象力的自由空灵的思辨，而在此之前，本能和感觉曾在世人的理论中占据特别重要的地位。初期哲学，就其总的际遇所容许的范围内，经历了极其深刻的变化，终于不再把生命赋予实在的物体，而是神秘地将其转移至通常肉眼看不见的各种虚构的存在物上，而后者的不断有效介入，从此便成为一切人间现象的直接源泉。这一富于特色的阶段，今天人们重视不够。而要考察神学精神的话却主要在这个阶段上；神学精神在其间获得充分的均匀的发展，后来那就不可能了。从各方面来看，这段时期是它发展的高峰时期，无论精神和社会状态都是这样。今天人类的大多数尚未脱离这种状况，三大种族的大部分人依然如此，只有黑种人的精英、白种人的落后部分除外。

在神学的第三阶段，即名副其实的一神教阶段，初期的哲学不可避免地开始衰落。这种哲学长期保持着巨大的社会影响，虽然其影响不过是表面多于实在。从此，由于富有特色的简化进程的自发结果，初期哲学的精神迅速减退。在这一进程中，理性越来越限制想象的先前支配地位，同时，视一切自然现象必然服从于不变规律的普遍感觉则逐渐发展起来，原先这种感觉几乎是微不足道的。这种初期状态的最后模式，仍以极

旷世名典

~~~~~

其多样的甚至彼此根本不相容的形式，存在于大多数白种人中，尽管它们更易于观察，但今天个人定见本身却常常妨碍准确判断，因为缺乏与前面两个模式进行相对合理而且公平的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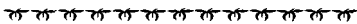
不管这种探讨方式今天看来如何不完善，但重要的是将目前阶段人类精神状况与其原先各阶段的整个情况密切联系起来，同时适当承认这种方式在长时间内是必不可缺的，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这里只限于作单纯的理性评价，首先强调非本意的倾向是毫无必要的；即便在今天，一旦我们要直接探求某种现象出现的基本方式的玄机妙理，尤其是面对我们尚不知其真正规律的现象的时候，上述倾向就明显地把我们所有人引导到本质上是神学解释的方面去。于是，杰出的思想家也会发现自己趋于单纯拜物教的自然倾向，这时无知与某种明显的欲念就暂时结合在一起了。因此，一切神学解释在现代西方人当中之所以受到进一步的断然废弃，那仅仅是因为它所追求的神秘研究根本不为我们的智慧所接受而愈来愈被排斥之故；我们的智慧日益习惯于代之以更有效的、与我们的真正需要更相符的研究，而且一发而不可逆转。真正的哲学精神面对简单现象以及处理如碰撞基本理论那样的简易问题已经占了上风；而即便在这样的时候，每当人们试图追溯某一事件的始因的时候，马尔布朗什<sup>①</sup>的难忘例子还总是提醒人们必须求助于超自然作用直接而经常的介入。然而，另一方面，这种试图今天看来虽然似乎幼稚不过，但的确已成为决定人类思辨持续发展的早期的唯一方法，从而自然而然地使我们的智慧摆脱深度的恶性循环。在这一循环中，我们的智慧首先必然被两个同样迫切而却

<sup>①</sup> 马尔布朗什（1638—1715），法国哲学家、神学家，笛卡儿哲学的热心推荐者。——译注



又根本对立的条件困住。因为，虽然现代人不得明确宣布：除非有充分的适当观察作为辅助，不然就无法建立起任何坚实的理论，但同样不容置疑的是：如果缺乏某种既定的思辨观念作一贯的指引，那么人的才智就绝不可能组织、甚至不可能收集必不可缺的材料。因此，这些原始观念显然只能出自于这么一种哲学，这种哲学就其性质来说，没有经过任何长期酝酿，而又是能接受的，简言之，它只是在直接本能的推动下就自发地产生的，虽然这种缺乏任何真实根据的思辨显得多么虚幻。这就是神学原则的独到之处。没有这些原则，人们就定会确信，我们的智慧永远无法摆脱最初的混沌状态，而唯有神学原则，通过对思辨活动的指引，才能够逐渐准备更为完善的逻辑体系。再者，这种基本倾向也因为人的智慧对不可解决的问题的特别偏好而得到大大地促进。原始哲学是特别追溯那些无法求解的问题的。我们只有充分运用自己的精神力量之后才能对其作出衡量并由此而明智地规定其使命。然而，这种不可或缺的运用，如无此类研究的强有力推动，则不可能加以确定，在自然功能最弱的方面尤其如此。而在研究当中，许多智力开发不足的人则仍然坚持对日常直接应用的问题寻求即时的全面答案。为了大大克服我们天生的惰性，甚至曾经需要长期求助于这种哲学自发地引起的强烈幻想，即关于人的能力可以随自己的意愿改变世界几乎是无所不能的幻想。当时的世界被理解为基本上按照适应人的用途而安排，而且任何重大规律都不能使之摆脱超自然力量至高无上的专横影响。仅仅三个世纪之前，在人类精英当中，星相学和炼金术的期望，即原始智力的最后科学遗迹才实际上不再用于逐日积累的相应观察上，正如开普





然地逐渐从此阶段过渡到彼阶段。于是名副其实的形而上学状态便介入我们智慧的基本进化过程。这种进化与任何突变格格不入，因而能够令人不大觉察地发生在纯神学状态与全实证状态之间，虽然这种不明显的状况实质上更接近于前者而不是后者。在这种状态下，主要的思辨依然保留着习惯倾向于绝对知识的基本性质，只是解答办法有了明显变化，更宜于推动实证观念的发展。事实上形而上学也像神学那样，主要试图解释存在物的深刻本质和万事万物的起源和使命，并解释所有现象的基本产生方式。但形而上学并不运用真正的超自然因素，而是越来越以实体或人格化的抽象物代之，后者真正有特色的应用常常可以用本体论的名义称之。今天要观察这种哲理探究方式轻而易举不过。这种方式用于极其复杂的现象仍然居于优势地位，每天都显示其悠久支配地位的许多重要痕迹，甚至连在最简单、最不发达的理论中也可见到。<sup>①</sup>这些实体的历史效用直接归因于其不明显的性质：因为在每一形而上的存在物中（为相应物体所固有而又不与之混同），人可以随其意愿或是看到超自然力量的真正表现或是看到被考察现象单纯的抽象支配地位，视其是否更接近神学状态抑或更接近于实证状态而定。这样，再不是纯粹的想象居于操纵地位，也不是实在的观察凌驾一切，而是推理获得充分的展开，并隐约地酝酿着真正的科学运作。再者，人们还应注意：由于存在着热中于推论而不是热中于观察的顽固倾向，思辨的成分一开始就被过分夸大；形而上学精神，在所有方面，通常便都以这种倾向为其特征，即

<sup>①</sup> 关于社会现象的几乎所有惯常解释，关于智慧的人与道德的人的大多数解释，我们大部分的生理学理论或医学理论，乃至好几种化学理论等等，还在这直令人回想起莫里哀以玩笑的口吻显示其特点的怪诞推论方式，没有任何严重的夸张之处，例如提及“鸦片安眠性能”的时候就是这样，这正符合笛卡儿给整个实体模式的决定性冲击。——原注

便在最杰出的人物当中也是如此。一套相当灵活的观念，全无神学体系所长期固有的稳定性，通过将各种不同的实体逐渐隶属于唯一的总实体——自然——之下，很快便达到相应的统一，而总实体的作用，是确定那隐约的普遍联系的微弱的形而上学等植物。那种联系来自于神论。

尤其是在今天，为了更好地了解此种哲学机制的历史效用，重要的是必须承认：就其性质而言，它只能自发地进行精神方面尤其是社会方面的批判行动或摧毁行动，而绝不能建立任何属于自己的东西。这种模棱两可的精神，根本上自相矛盾。它还保留着神学体系的全部基本原则，但却日益抽掉为其实际权威所必需的活力和稳定性。事实上，从各方面来说，它主要的短暂功用就寓于这样的劣质变化之中，而对于人类整个演变曾长期起进步作用的旧模式，不可避免地到了过度延长的程度；那旧模式硬要使人类的童年状态长存下去，而开始时它倒是作了成功的引导的。

因此，归根结底，形而上学实际上不过是受瓦解性简化冲击而变得软弱无力的一种神学，这自然而然使之失去阻碍实证观念专门发展的直接权威，而同时又令其保留着用以维持一定程度必须运用归纳的智力的临时能力，直至归纳的智力最后能获得进一步的充实为止。形而上学的或本体论的模式，根据其矛盾性质，一直面临着不可避免的抉择：要么趋向于徒劳无益地恢复神学状态以符合秩序条件；要么走向全然相反的状况以摆脱神学的高压控制。这种必然的摇摆，今天只见于最艰深的理论方面，从前连最简单的理论方面也都存在，只要其形而上学时期延续下去就会这样，因为这种探讨哲理的方式一向不具有组织的能力。要是公众理性长期以来没有把这种探讨哲理方式同某些基本观念分开，人们仍然可以不必害怕肯定：两千年前，这种探讨方式所引起的关于外物存在的荒诞疑问基本上依





然会存留下去，因为这种方式确实从来没有以任何决定性的论据消除它们。因此，归根结底，我们可以把形而上学状态视作是一种慢性病，那是我们个人或集体从童年至成年的精神演变过程中自然固有的。

在现代人中，历史思辨几乎从未追溯至多神论时代以外，形而上学精神看来几乎与神学精神一样古老，因为它必然支配（尽管并非以明显方式）从拜物教转向多神教的早期演变过程，从而代替纯粹的超自然作用。于是，超自然作用直接脱离每个具体物体，也就会自然而然地让某种相应的实体存在。然而由于这首次的神学革命当时并未引起任何真正争议，因此本体论精神的不断介入只有在下一轮革命中才开始变得那么富于特色，由是将多神论缩简为一神论，它也就成为一神论的天然工具。只要它依然受神学冲动的支配，它不断增长的影响最初看来是建设性的，但后来其基本上属破坏性的本质越来越明显地表露出来，此时它逐渐试图将神学的简化推进到超越于庸俗的一神论，后者才必然是初期哲学真正可能的最末阶段。这样，近五百年来，形而上学精神通过逐渐瓦解神学体系，消极地促进了近代文明的根本发展。中世纪末期，一神论体系的社会效能已基本衰竭，自此神学体系终于成为落后的东西。不幸的是，本体论概念的过长作用，在每一方面完成这种不可缺少的然而又是暂时的职能之后，总是趋向于阻止另一种思辨体系的真正建立，竟致于这种精神今天实际上成为妨碍真正哲学最后确立的凶险障碍，它依然常常独占哲学思考的优先权。

这一段必然的漫长开端最后把我们逐渐获得解放的智慧引导到最终的理性实证状态。这一状态理应比前面两个初阶状态获得更专门的说明。这样的预备性活动令人自发地看到初期哲学（无论神学的或形而上学的）固有的根本无用的含糊而武断的解释，自此以后，人类智慧便放弃追求绝对知识（那只适宜